

灯下书

得文记趣

谨以此文呼应陆文夫老师的《得壶记趣》

| 史俊棠 文 |

1990年初,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为迎接十周年厂庆,除了计划八月份在北京工艺美术馆搞一次“迎亚运宜兴紫砂精品展”,还与当时尚未停办的上海《文汇报》共同发起紫砂文化征文活动,旨在进一步弘扬和推动紫砂文化的发展。

为确保征文活动能有所收获并取得成功,我和时任《文汇报》主编的周嘉俊同志商量,双方都请一些知名作家,写一点有影响的文章。因多年担任紫砂二厂厂长,我也认识并交往了一些作家,就自告奋勇地报了一些作家大名,其中包括陆文夫先生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老周听我提到陆文夫,当即就敲定,要我负责约陆文夫的文稿,并敦促抓紧落实。

于是我就立即与陆老师联系。当他听说是为厂庆搞紫砂征文活动时,他十分赞赏,而对自己是否写文章,当时在电话里未置可否,我估计问题不会太大,大作家嘛,写篇文章还不是小菜一碟。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,时间一天天过去,由于种种原因,《文汇报》只能坚持到6月,也就是说7月就要停刊了。至4月底,该来的文章陆续到来,唯独陆文夫老师的文章迟迟不见动静,上海周嘉俊老师也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催问,我也真的着急了。时间已是5月初,看来光电话催稿甚至托省作协的朋友帮忙也无济于事了,这事千万不能“黄”,怎么办?上苏州登门拜访求文章。

1990年5月13日,我和徐秀棠老师一起赶到苏州,陆文夫老师在家里热情接待了我们。我进门见面就提到紫砂征文一事。陆老师说:“不是不想写,而一时不知道写什么好,实在不好意思。”我一听更着急了。就在这时,他的老伴从里屋走出来,见到是宜兴紫砂厂来人,转身就去拿出一件紫砂雕塑工艺品,一看就知道是徐秀棠早年作品《雪舟学画》:一个小和尚,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,躺在木鱼上睡着了。只听老太开口问道:“这件作品上有‘长乐’两字,是谁做的?而敲木鱼的棒槌不知怎么弄断了,能否配一根?”我赶忙抢着说:“作者就在眼前,高级工艺师徐秀棠(当时尚未评大师),‘长乐’是他的笔名,至于配根棒槌嘛,没问题,包在我身上。”这时的陆文夫老师不知怎的也来兴趣了,随即转身进去,双手捧出一把鱼化龙紫砂茶壶,递给我并问是谁做的。乍一看,一把鱼化龙茶壶,太普通了。然而当仔细翻看这把茶壶时,我心里咯噔一下,好家伙,清末制壶名家俞国

良的作品,还是钨灰的,完好无缺。作品年代已久,韵味十足,真是件宝贝,不可多得,实乃紫砂器之上品。这时的陆文夫老师来劲了,说是上世纪50年代他在写作之余逛地摊买来的,当时没花几个钱,贵了也买不起。他说:“我喜欢它,之后一直用它泡茶,我在案头写作,它像一个忠实的侍者陪伴着我。几十年了,始终不离左右。”真是天赐良机,我料定这下不愁没有文章写了,于是急忙说:“陆老师把这件事写出来,十分有趣。”他也笑着说:“写、写,我一定写。”当晚还在苏州,我就电话告诉了上海周嘉俊老师,他听了很高兴,说:“好,我等着这篇文章。”第二天我回到宜兴,心里还觉得不踏实,就翻了《宜兴陶器图谱》,把其中记载俞国良的一段文字摘抄后立即寄到苏州。没有几天一篇出自陆文夫之手的文章寄来了,我当即送到上海《文汇报》,周俊嘉老师说:“老史,真有你的,当时你夸口说叫陆文夫为紫砂征文写文章,我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,看来你是锲而不舍,志在必得啊。”厂庆结束后,我们将此文汇编入《紫砂春秋》一书的人文题咏篇章。

若干年后,偶尔翻阅陆文夫的散文集《壶中日月》,再次读到这篇文章,要说写得有多好,不是我能评说的,我只知道紫砂文化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他在此文中写道:“这把龙壶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岁月,度过了很多寒冷的冬天,我没有把它当作古董,虽然我也估摸得出它的年龄要比我祖父的年龄大些。我只是把这把茶壶当作忠实的侍者,因为当我想喝上几口茶时,它总是十分热心的。这把壶的用与不用,和我的写与不写是同步的。当我能写的时候,特别是冬天,它总是满腹经纶,煞有介事地蹲在我的案头,当我不能写而去劳动时,它便浑身冰凉,蹲在一口玻璃橱内,成了我女儿的玩具,女儿常要对她的同学献宝,因为那龙头可以伸出舌头。”在文章结尾时,他写道:“客人走了以后,我确实高兴了一阵,想不到花了八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,穷书生也有好运气,可入《聊斋志异》了。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难了,今后还用不用这把茶壶来饮茶呢,万一在沏茶倒水之际失手打碎岂不可惜!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高贵的客人,这场面倒也是十分尴尬的。”

陆文夫老师为该文取的题目是《得壶记趣》,而我的这段小记可否叫作《得文记趣》呢?

片羽

梁溪昆曲与邹迪光

| 陈益 文 |

潘之恒,明代安徽歙县岩寺人,长期生活在南京、苏州等地,晚年则在黄山专心整理著述,详细记录了从隆庆四年(1570)至万历四十七年(1619)五十年间昆山腔演出的珍贵史料。这位著名戏曲评论家、诗人,与汤显祖、沈璟等戏曲家有很深的交谊。有人说,潘之恒的一生是在“宴游,征逐,征歌,选伎”中度过的,是“品胜,品艳,品艺,品剧”的一生。确实,当时的人们捧若权威,无不愿意把他视为“赏音”,誉为“独鉴”。不管是谁演唱昆山腔,只要得到他的赞许,就算有了定评。

读潘之恒的代表作《鸾啸小品》,可以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述:

“梁溪之奏技也,主人肃客,不烦不苛。行酒不哗,加豆不叠,专耳目。一心志以向技。故技穷而莫能逃其为技也……拜趋必简,舞蹈必扬,献笑不排,宾白有节,必得其意,必得其情,升于风雅之坛,合于雍熙之度,此清贵之独尚者也。”

潘之恒所“独鉴”的,是梁溪(无锡)人邹迪光的昆曲表演技艺。邹迪光,字彦吉,号愚谷。万历二年(1574)进士,曾任工部主事,官湖广提学副使。明万历十七年罢归,在故乡惠山下修筑愚公谷。位于惠山寺甬道南的愚公谷,时人称“胜绝吴中”,为全国四大私家园林之一,今天仍然是锡惠公园中一处幽静多姿的古典园林。邹迪光所建的惠山宝善桥,是沟通寺塘两岸之桥。桥畔即为惠山泥人的产泥区。

当年,邹迪光与文士觞咏于愚公谷,极园亭歌舞之胜。他的演唱之精妙绝伦,潘之恒不遗余力地大加赞赏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邹迪光极其有分寸感地掌握了昆曲水磨腔的演唱要旨,没有一点儿烟火气,却又丝丝入扣,动人魂魄。众所周知,昆曲的演唱难度颇高,其艺术魅力正在于此。潘之恒的另一句话,“竹音(即笛声)劲者可以裂石,可以断肠;肉音(即唱腔)微者可以魂销,可以情死”,恰好能用来作注解。

明嘉靖年间,魏良辅、梁辰鱼对昆山腔进行了大胆改良,水磨腔调一跃而成为诸腔之首,“四方歌者皆宗吴门”,一时缙绅豪门、文人士大夫蓄养家班迅速形成风气,无锡作为昆曲繁盛之地,更是独领风骚。

其实,当年辅佐魏良辅改良昆山腔的有不少人。比如善洞箫的苏州张梅谷,善笛子的昆山谢林泉,优秀歌手张小泉、季敬坡、戴梅川、包郎郎等等,这些人构筑起一个志同道合的艺术沙龙,经常切磋技艺,将昆山腔打磨得像水一般委婉柔美,像玉一般温润细腻。值得一提的是魏良辅有一个弟子潘荆南,是梁溪(今无锡)人,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昆山腔的精髓,在梁溪带动了流行风潮。《锡金识小录》卷八载:“荆南游处必携以箫管合曲,一时竞相传习,世谓度曲之工始于玉峰,盛于梁溪。”民间还有一句谚语说,“无锡莫开口,谓能歌者众也”。

万历年间,生活在惠山脚下的邹迪光,不仅大兴园林,且拥有两套家班,家班规模与优伶水准都堪称江南之最。当时的邹氏家班,不仅能演全本55折《牡丹亭》,还特意邀请汤显祖亲临戏场观摩,被曲家誉为美谈。

邹迪光四十岁时辞官回无锡。一生著有《郁仪楼集》《调象庵集》《石语斋集》《文府滑稽》等。其《郁仪楼集》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万历某年的五月二日,传奇作家屠隆带了屠氏家班来到无锡,邹迪光、屠隆与一群好友如俞羨长、钱叔达、宋明之、盛秀常等人,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愚公谷相邻的秦园演出屠隆的《昙花记》。“昨于秦园玩,尊使搬演《昙花》”。与此同时,他还挥笔为《昙花记》的演出赋诗三首,其中一首这样写道:“谁唱新声到梵宫,昙花此夕领春风。哪知竺国多罗义,只在梨园傀儡中。柘鼓轻挝留白日,刀环小队踏飞虹。人生何可长拘束,酒色声闻理自通。”梁溪文化人相聚于秦园(即寄畅园)纵情演唱昆曲,为欢竟日的欢愉,溢于言表。

据徽州地方史料记载,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戏剧家、后七子盟主王世贞,曾带领江浙一带的文士一百多人,经由水路迤逦前往徽州,作黄山文化之旅。当时,汪道昆和潘之恒代表徽州方面给予热忱接待。他们组织徽州文人、演员“各逞其技”,与之对垒,尤其是潘之恒的家班演出,增添了这次文化“比武”的气氛。三年以后,文学家袁宏道也来到徽州,并在潘之恒家作客,看了潘氏家班演出的昆曲,萌生了比试的念头。翌年,黄山脚下的岩寺镇,一下子搭起了三十六座戏台,文学家袁宏道带领苏、浙一流演员,前来登台献艺。无锡邹迪光的家班自然也参与盛事。连续三天三夜的对台赛,让演员们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。事后,潘之恒作如此评价道:“迎春之盛,海内无匹,即新安也仅见也。”

邹迪光、屠隆在梁溪秦园隆重上演《昙花记》,与之有异曲同工之美。所以,潘之恒的《鸾啸小品》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

春讯

摄影 周信